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赵一曼



她柔弱而坚强，纤细而挺拔。她是母亲、妻子和女儿，具有中国妇女所具备的优秀品德与情感。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更具有共产党员的勇敢与坚毅。她就是中国著名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一、与封建礼教抗争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乳名瑞女儿。

1905年正是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已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各帝国主义国家在猛烈地瓜分着中国这块大肥肉，中国大地民不聊生、尸骨遍野。一些革命志士寻找着一条解放祖国、拯救人民、恢复中华之路。

就在这一年的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白花场白杨嘴村一个生活条件优越的地主家庭。母亲生了他们兄妹八人，一曼排行老七。虽说家庭生活条件好，但她童年时代并没有多少快乐，她几乎被封建礼教压迫得窒息。

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家庭，使她从小就形成了不屈的性格。记得她小的时候，时常有人到她家里来告状，每次告状都是因为她为别人打抱不平去打架。与别人打架时，不管对方的个子多高大，她都不怕，硬是与人拼命，从不肯让步，直到对方先住手她才罢休，而她早已被打得浑身是泥了。

十岁那年，母亲按照封建习俗要给她裹足，这是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一种压迫和束缚。不裹足就会被看作大逆不道，可她偏不信邪，又哭又闹在地上乱蹦，母亲生气地训斥她说：“女人家长着一双大脚丫儿，有多难看！”她挺着胸毫不示弱地说：“脚是走路的，又不是给人家看的！我就是不裹！”母亲只好叫人来帮忙，母亲硬是把她摁（èn）倒在床上，用长长的白布条把她的双脚裹起来了。之后，母亲厉声地对她喊道：“从今天起不许你出门，更不能在大路旁停留，一切男人都不能见！”她待母亲走开后，看到自己的两只脚被白布条里三层外三层地裹着，越看越气。趁母亲不在，她拿起剪子飞快地把裹脚布剪得粉碎，还把母亲早就给她做好的那双小尖尖鞋用砍刀砍烂。消息在村子里传开，家族的长辈们都来训斥她，还叫她的母亲好好地对她“严加管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母亲一次次地逼她，她一次次地反抗，最后她干脆以绝食来抗议，母亲没办法了，叫来她的大哥管教她。自从父亲死后，大哥就成了家长，他板着脸大声喝道：“你裹不裹脚？”“不裹！”一曼一点不示弱。“你有什么理由不裹脚？”“我就是不裹！”一曼话刚出口，大哥的巴掌已打过来了，一曼被打倒在地上，她倔强地爬起来，更坚定地冲着恼羞成怒的大哥说：“你打吧，打死我也不裹脚！”大哥野蛮地抡起拳头狠狠地打她，嘴里还不住地叫着：“我打死你这个疯丫头！”站在一旁的母亲心疼了，把她拉开。后来，一曼故意当着众人的面洗脚，母亲毫无办法，只好屈服了。就这样，她在和封建礼教的斗争中保留下一双大脚。

一曼的大姐夫郑佑之是个正直向上的青年，曾作过她半年的家庭教师。一曼由衷地喜欢他，觉得他很了不起，懂得很多知识，有说不完的新鲜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喜讯传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展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郑佑之很快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成为四川地区很有影响的革命者，也是宜宾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一曼在大姐夫的指导帮助下，开始阅读《妇女杂志》、《向导》、《中国青年》、《觉悟》等宣传革命的进步刊物。为了避免家庭的阻力，她常常躲在后院青竹林或自己的房间中偷偷地阅读，书上的革命道理雨露般地滋润了她的心田。她像一株久旱的小苗拼命地汲取着营养和水分。一下子她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道理，有时她读得入了迷，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

这件事后来被她那继承父业的哥哥发现后，骂她读了这些书，被引向了斜路，不允许她再读。一天，哥哥趁她不在家，搜了她的房间，把所有能找到的书一齐投入火中。她气愤极了。大火能烧毁书籍，却烧不掉她向往革命的心。这以后，她把大姐夫给她订的这些进步刊物先寄到二姐家，然后她再去取回来藏在坛子里，以挑花为掩护关起门来读书。她还常常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写在信里，寄给她不能常见面的大姐夫。

郑佑之从事革命工作很忙，很难与小一曼见上一面，但他喜欢一曼的斗争精神，也为她的进步而高兴。他除了亲自为一曼订阅些进步刊物外，还托人给一曼寄来《中国共产党宣言》、《女子参政之研究》等革命书籍，在郑佑之的帮助指导下，一曼进步越来越快。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与一曼通了上百封信。在一封信中他鼓励一曼说：“我看见你激烈的性情，过人的聪慧和近来感受压迫的痛苦，我已认定你是个改造社会的得力人才了。”1923年冬天，一曼经过大姐夫及何珽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姐夫一步步的引导下，她走上了背叛自己封建家庭的道路。

一曼自从学习了革命理论，眼界开阔了。她感到自己整天在家关门自学，常受到哥嫂的责骂和限制，因此想走出村子到宜宾城里读书去。当她刚向哥嫂提出读书要求时，立刻遭到他们的辱骂，并说：“你有本事你去上学吧，我没有钱。”一曼力争说：“你有钱嫖赌、吸洋烟，就没钱供我读书？”嫂子站出来骂她是个“贱婢子”，不准她出门。为此，一曼气得得了肺病，吐了血，她再也忍受不了封建家庭对她的束缚。她拿起了笔，把哥哥在家里实行封建压迫的情形写出来，让社会都知道这种封建礼教是害人、坑人的。在这篇文章中她一股脑儿把自己的苦恼、愤怒、痛苦都写出来了，她这样写道：“全世界的姊妹们，请看我们的家庭，是何等的守旧！是何等的黑暗！我自生长在这个黑暗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地把我关在那铁篱城中，受那黑暗之苦……觉得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做私有财产社会的奴隶……我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极想挺起身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们读书。……务望亲爱的同志援助我，替我作主呀！”这篇文章是对封建礼教的揭露，也是一个生活在封建礼教之下弱女子的抗争。她把写好的文章寄给了大姐夫郑佑之，郑佑之看后为她有这样的勇气和觉悟而高兴，立刻把这篇文章寄到上海、天津。

1924年8月6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以“被哥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为名，发表了一曼的文章；18日天津邓颖超主编的《女星》也以同样的题目发表了这篇文章，两刊还发表了声援一曼的文章。一曼看到自己的奋起抗争得到了社会进步势力的支持，激动不已，也坚定了她斗争的决心。

自从她的文章发表后，哥嫂更加恨她，常常刁难她，可她斗争精神更强了。她常偷偷溜出家门，去村里和妇女们交谈，在与这些贫苦姐妹的接触中，她更清楚地了解了她们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的痛苦生活，十分同情她们的悲惨遭遇。1925年初她按照共青团组织的意见，把村里的妇女们组织和发动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她任文书，负责日常的工作。由于她的积极工作，会员很快从30多人发展到180多人。接着又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她们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还学习妇女解放的道理。

妇女解放同盟会的活动遭到了村里封建势力的反对，常有人冲进学校起

哄、捣乱，殴打妇女和女子学校的教师。一曼和妇女同盟会的姐妹们看到这种情况立刻组织反击。她们向四川和宜宾地区的学校和进步团体发出信函，寻求社会的支持。这些呼吁很快有了反应，他们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给白花场妇女同盟会发信表示声援。在一曼的积极组织下，这里的妇女运动发展很快。

一曼的反抗及开展的妇女运动，引起了同族们的不满，他们围着一曼的大哥，一定要他对一曼严格管教，否则要把一曼关起来。有些人给一曼的哥哥出主意，要他赶快给一曼找个厉害的婆家，好让公婆去管教他。一曼的大哥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经过策划，找来一个媒婆给一曼说媒，想把一曼赶出家门。

一曼经过斗争的锻炼，已不再是一个弱女子了。一天，看到媒婆又来到她家，就去割了一把藿麻等在大门外，媒婆刚一出门，她就冲过去说：“媒婆，你听着，我家的事不用你来管！”说着她把手中的藿麻拿到媒婆眼前挥了一下，“以后你要再敢上门来，我就用这藿麻收拾你。你知道，我是说得出做得到的。”媒婆吓得倒退了几步，战战兢兢地连声说：“我不敢了，我不来了，……”说完转身逃走了。一曼进屋对哥嫂说：“要不要结婚是我个人的事，不用你们包办！我知道，你们怕我连累了你们。那好，请把婚姻费用给我，让我去读书。城里的中学正在招收女生，我要去考，离开这个家，省得连累了你们！”嫂子一听就冲着一曼喊叫起来：“让你嫁人你不嫁，反倒要到男学堂读书，男女混杂，同进同出，还成什么体统？”赵一曼气愤地说：“男女都是人，为什么不可以在一起读书？”哥哥冲到她跟前，喊道：“不嫁人就别想出白杨嘴！读书，在家里读，钱，一个也没有！”一曼到城里读书的要求，再次遭到哥嫂拒绝之后，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离开这个家。

二、冲出罗网

一曼为上学的事与哥嫂闹翻了。怎么办呢？她只好去找平时最知心的二姐商量。她决定从家里逃走，冲出罗网。临走时，她去与母亲告别，母亲泪流满面地舍不得她离开，她与母亲谈了一夜，谈到妇女的苦难，谈到世道的黑暗。最后，母亲终于被一曼说服了，同意她去读书的要求。

1926年正月初五是个晴朗的日子。赵一曼按照与二姐商量好的时间，趁哥嫂不在家时偷偷来到二姐家。然后由二姐和二姐夫把她送到叙府（今宜宾）城里，交给大姐夫郑佑之。在大姐夫的安排下，她考上了女子中学插班生。

一曼从来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学习，只是在家读了几年私塾。入学后，她的数学、英文比其他同学差，再加上她从乡下来，岁数大，班里有很多同学看不起她，甚至背后讥讽她。她却心胸开阔，主动接触那些看不起自己的同学，自己却暗地里下功夫，她终于以自己的诚恳感动了周围的同学们。她有空就给同学们讲她在乡下组织白花场妇女同盟会的事情，还常带些进步刊物给她们阅读。

有一天，语文老师出了一篇名叫“不如归去与炒米糖开水的声音谁更凄惨？”同学们都不知该怎么写，只有赵一曼拿起笔来就写，她写了“不如归去”是杜鹃鸟受到自然界的压迫而发出的声音，“炒米糖开水”是在静静的黑夜里，有钱人家的人们在暖和的屋子里的舒适的床上熟睡的时候，无钱人家的人们为了维持生活而不得不在寒冷的街头发出叫卖声，他们在饥寒交迫地等着那些消遣的人吃喝，叫卖声喊出了穷人的痛苦和社会的不平，所以比杜鹃的哀叫凄惨很多。语文老师看了她的文章，认为她写得好，要她在班里朗读，同学们听了都很敬佩她。日子久了，同学们很愿意与她接触，也很信任她。在学校学生会成立大会上她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长，以后又被选为宜宾县学联常委，成为宜宾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她还担任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

一天，学校贴出一张布告，规定中学班的同学必须挽髻（jì），即把头发束成一个圆球盘在后脑勺上。团支部决定由一曼带头剪发，反对这种封建规定。一曼接受了这个任务后，第二天一早带几个同学散着头发去找学监，七嘴八舌地嚷嚷：“我们不会挽髻，请先生帮帮忙！”这个学监一听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站在那里发呆。一曼趁机说：“你不帮忙，我们只好把头发剪了！”说着用剪子把头发剪了，同学们也都跟着把头发剪了。在她们的带动下，宜宾女中及校外的妇女形成了一股剪发热。

1926年夏天，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在北伐战争的影响下，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空前提高。为反对帝国主义，许多地方开展了抵制“洋货”的斗争。

这一天，奸商李伯衡用船只替英帝国主义商人贩运洋油。消息传来，宜宾党团领导爱国运动委员会决定通过学联发动一次抵制仇货的斗争。赵一曼在女中开展了宣传和发动工作，她反复向同学们讲仇货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抵制仇货就是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运油船只刚要到达，一曼立刻带领同志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经济侵略！”等口号，冒雨向大南门外王爷庙码头冲去。不久男中的同学们也赶到了码头。雨越下越大，同学们的衣服都被大雨淋湿了，没有人退却，转眼功夫码头上就聚集了两千多人。当轮船靠近码头时，一曼带领同学们拣起石头向油轮抛去，阻止油船靠岸，学生们一直在雨中坚持斗争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李伯衡妄想利用工

人把油运上岸，一曼立刻站出来满怀革命激情地向工人们宣传反帝爱国抵制洋油的道理，她对工人们说：“工人兄弟们，我们不能搬呀！这油桶里装的不是煤油，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汗！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工人们被深深打动，一位老工人拉着一曼的手说：“孩子，你说得对！穷哥们，咱们上了李伯衡的当！快把煤油扔到江里去！”工人们愤怒地把手中的油桶扔到滚滚的长江中去了，学生们也纷纷跳上船帮忙。李伯衡勾结反对军队来镇压学生。面对凶恶的反动军队一曼无所畏惧，她跳上高坎用高昂而坚定的语调讲演，鼓舞学生们的斗争。反动军队的头目杨仲才拼命挥舞着手枪冲到一曼跟前，声嘶力竭地吼叫：“马上给我滚，不滚老子就叫你脑壳开花！”赵一曼瞪了一眼杨仲才，说：“开枪吧！你们杀吧！你们难道不是中国人？为啥不把枪口对准帝国主义、对准军阀？”学生们蜂拥而上，连推带拉，使杨仲才只有招架之力，毫无进攻之功，只好逃跑。

为保存革命力量，党团组织决定留一部分人护旗和看守，其余同学返回吃饭、休息。经过几天雨中斗争，一曼发烧患病，感到浑身无力。可她刚跨进学校就听说反动军队扣留了谈判代表和打伤护旗守油的学生，她立刻组织学生去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带领学生组织成一个个宣传队在宜宾城内到处张贴标语、布告，进行讲演，并以党团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全省和全国学联的支持。全国各地纷纷来电声援宜宾学生运动。在强大的压力下，敌人只得释放被捕学生和学生代表，全部煤油被低价拍卖，宜宾学生运动取得了彻底胜利。经过斗争的考验，一曼被吸收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学生的爱国热情遭到反动势力的仇视，不久，学校将一曼开除。

为适应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广东黄埔军校在武汉设立了分校，面向社会招收学员。赵一曼听到这一消息，决定去报考，党组织把她保送到了那里学习。

进入黄埔军校，赵一曼脱下了花袄、旗袍，换上了军装、戴上了军帽、打上了绑腿，转眼就成了一名国民革命军的女战士了。她刻苦锻炼自己，迅速成长起来。入校后的第二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国共两党分裂了。在革命低潮中，许多人宣布脱离了共产党，军校里的学生中也有一部分出现了动摇。一曼却坚决地表示：“不，我决不回头，我要战斗下去，继续奋斗下去。”行军途中她病倒了，只好隐蔽在一个老乡家。她病好后不久，党组织派她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

三、在白区的岁月

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她与同学陈达邦结了婚，不久她肺病复发，党组织决定送她回国。当时正是1928年初冬。西伯利亚北风呼啸，到处是冰天雪地，要通过国境线既不能坐车，又不能白天走。已是满脚冻伤的赵一曼拖着带病的身子，再加上她已经怀孕，行动十分困难。她在同行同志们的帮助下，几乎是爬过边境线的。当她回到祖国时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经过短期恢复，她接受了党的派遣，来到湖北宜昌做秘密工作。

宜昌是湖北通往四川的要道，行人到了这里都要换船。党组织要在这里设立一个联络站，用来从事传递文件和安置干部等工作。

赵一曼通过朋友租了一间江边的木板棚房子，每天和房东老太太同住。在这里她了解了码头工人们的生活，在秘密工作中自己也得到了锻炼。但是她的临产期越来越近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是不能够租房生孩子的。房东老太太虽是个穷苦人，但却摆脱不了这个封建习俗的束缚。老太太一定要赵一曼离开这里。赵一曼恳求她：“让我留在这里吧！我一个人能到哪里去呀？”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她一面清扫房屋，一边说：“你得走，你不能住在这里。”赵一曼的几次央求都无济于事，这回她真的火了，她对老太太说：“好，我走！我就是生在野地里，也不进你家的屋子！”

倔强的一曼托着沉重的身子在荒凉的旷野里转了半天，也租不到一间房子。她边走边想：“我不能离开这里，这是党组织的联络站，同志们和党组织还都不知道呢！”这样想着她又转身返回了江边的那间木板棚房子前。房东老太太已经把房门锁上了，无论赵一曼怎么叫门她也不肯开。这时赵一曼的肚子阵阵作痛，她含着眼泪坐在门外。恰巧隔壁邻居看到一曼这副样子就收留了她，为她隔出半间房子，一曼才又得以安身把孩子生了下来，起名叫宁儿。这家的主人是个码头工人，一曼和他相处得很好，一次这个码头工人出了事，被抓到警察厅。为了解救这位工人，她将自己的戒指卖掉，工人被赎了回来，她却因为这只戒指而引起了警察厅的注意。暴露后，她只好离开宜昌来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党组织得知了她的情况后，决定将她安排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做秘密工作。上海是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城市。两年前，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在这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两年来，上海一直被反动政府统治着，这里的群众发动工作很难进行。她到了这里经常与过去的同学和战友来往，互相帮助，协同工作。她深入到女工中与她们促膝谈心，宣传、动员她们参加到革命运动中去。

不久，根据党的需要，她又被调到了江西省机关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了工作和安全，她与一个姓王的男同志建立了一个新“家庭”，一曼带着孩子与小王出出进进，看上去还真有些像恩爱夫妻。利用这个“家庭”的掩护，他们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

但是，就在这时革命队伍里出现了叛徒，党的机关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一天晚上，赵一曼将孩子哄睡后，自己独自坐在屋子里思考问题。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赶紧起身去打开门，只见小王气喘嘘嘘地说：“快走！出了叛徒！”说着，他抱起熟睡的孩子一边塞到一曼的怀里，一边把一曼使劲往外推，然后又转身去烧文件。这时门外响起猛烈的砸门声，还夹杂着拉枪栓的声响，一曼知道敌人已经来了。她迅速打开后门，稍等了一会儿，想

同小王一起走。可她清楚地听见了吼叫声，敌人进屋了。他们大声对小王喝斥着：“别动！”一切都来不及了，她只好抱着孩子向风雪中跑去。

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哪里去，只是在漆黑的夜晚，顶着漫天的风雪，一个劲地向前奔跑，借着雪地光线，勉强地辨认了一下前方的路。突然，她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了，怀里的孩子哇哇地大哭着，她心里发慌，用手紧紧地捂着孩子的嘴不让他出声。这时，她感到很后悔：革命工作这么紧张，自己却偏偏生了个孩子拖累自己。要是没有这个孩子，我可以更专心地投入工作，可现在……。终于，她找到了一个草垛，抱着孩子钻了进去，用草盖住孩子和自己的腿坐下。一直呆到天亮。她找到了一个好心人家烤了烤火，喝了口水，又抱着孩子来到江边，望着这滚滚的江水，她决定回上海去寻找党组织。

她拿出自己从苏联回国时丈夫送给她的那块怀表，央求船主说：“我是带孩子进城找他爸爸的，没想到在路上碰见了土匪，我被抢得只剩下了这块怀表。”她向船主递过怀表，又说：“请把我们带到九江吧！”船主同情她们母子的遭遇，让她们上了船。在船上，她与船夫们聊天，很快就熟悉了。第二天一到九江，船夫帮助她们母子换上了另一只到上海的船。船主怕她是红军的探子，给自己惹麻烦。她向老板说自己是逃难的，是去找孩子爸爸的，在她反复的恳求下，船老板才勉强答应她上船。

两天后，船终于到达了上海。上岸后，船老板派了一个茶房跟着她索取船票钱，她还没有找到组织到哪里去找钱呢？赵一曼一路走一路想一定要甩掉这个伙计。于是她找到一根草绳做了个草标，插在孩子身上，她故意高声喊着：“卖孩子，换船票钱！”她把卖孩子的价钱要得很高，没有人来买反而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一会儿警察来了把她们母女俩轰走。她又来到另一条街上卖儿子，这个茶房看她真的没有钱，只好回

赵一曼摆脱了伙计的跟踪，来到了上次来上海时曾住过的“湘记旅馆”，给她在宜宾女中最要好的同学、共产党员郑秀石打电话。在郑秀石的帮助下，她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这次，党组织仍然要她在上海党中央的机关里工作。她有时打扮成文弱的小学教员；有时打扮成富人家的阔太太；有时打扮成有钱人家的女佣人，为联络同志、传递情报，出没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这些日子里，她每天都在紧张的环境中度过，一点点的动静都会引起她注意，甚至晚上睡觉都是穿着衣服的。在中央机关里她正巧碰见了丈夫的妹妹陈琼英，两个人商量后决定，把宁儿送到堂兄陈岳云家，自己可以无牵挂地为党多做些工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下，东北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而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斗争，派出了不少优秀共产党员去东北三省发动群众，赵一曼就是在这时被党组织派到东北工作的。

赵一曼一来到沈阳就到了一家烟草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卷烟女工。每天在工厂，她一面熟练地卷着烟卷，一面热情地向女工们打招呼，和她们聊天，问寒问暖。很快她与卷烟厂的女工们熟悉了。只要有机会就向姐妹讲大家受苦受难的根源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军阀的统治。她告诉姐妹们不要怕工头、资本家，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能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就能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在她的说服教育下，女工们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半年后，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省委迁到了黑龙江省的重要

城市哈尔滨。她也来到了哈尔滨，被分配在省委领导的省工会做组织工作，不久又担任了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哈尔滨是个美丽的城市，高大的俄罗斯式的房屋，整齐的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空气格外新鲜。但哈尔滨也是一个黑暗的城市，日本帝国主义无情地侵占了这里，蹂躏着中国人民，日寇、伪军、警察横行于市，白色恐怖笼罩的哈尔滨像是一座大监狱。赵一曼来到这里，是在日伪军的眼皮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了掩护党的组织和保护自己，她和满洲总工会书记老曹又建立了一个“家庭”。

在哈尔滨，日寇早已实行了“联保制”和“良民登记制”。她和老曹刚到哈尔滨市找不到合适的人为他们铺保，因此他们租不到房子。后来听说南岗区的俄国侨民住宅不必向日伪警察报户口，只要交了房租，什么时候来住都行，没人过问，只是房租贵些。他们认为这倒是开展地下工作的好地方，于是他们在这里租了一所住房。

一曼工作起来十分谨慎。白天，有时她坐在门口缝补衣服，机警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为“丈夫”等人的工作做掩护；有时在家里家外忙着做饭、洗衣服，像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可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去伏案抄写文件或忙着印刷传单。有一天，在她家里几个工会的同志正在开会，以桌上的麻将牌作掩护，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就假装打麻将。一个特务对他们产生了怀疑，想以进屋抓赌为名查明情况，当时桌上还摆着党的秘密文件，情况万分危急。当这个特务来到桌前时，一曼从容镇定地端起事先准备好的浆糊一下子泼到他脸上，大家蜂拥而上，把特务捆绑起来待天黑后将他沉入松花江里。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她一面做党的机关工作，一面深入工厂做工人的发动工作。有一次，一个姓孙的日本警备司令部警备营的营长，穿着便衣上了一辆电车，不买票还把售票员拉到宪兵队毒打了一顿，当这个售票员被抬回车队时已被打得半死。电车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提出要罢工，抗议这一暴行。党组织决定支持电车工人这次行动。这天深夜，赵一曼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她刻蜡版、印传单整整忙了个通宵。第二天天刚亮，她把印好的传单捆好后放在篮子里，上面盖上几件要洗的衣服就出门了。她从容不迫地穿过哨卡，把传单送到罢工委员会，之后就和工人们一起上街宣传、讲演。她看到每个车站都站满了等车的人，就挤进人群，对身边等车等得不耐烦的人们说：“听说电车工人们罢工了！”“为什么？”人们好奇地围拢过来询问。赵一曼气愤地对大家说：“警备司令部的人坐车不买票，还打人，真够凶的！”她带着人群从一个车站走向下一个车站，她边走边向群众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日伪勾结压迫工人，使工人们无法生活的事实。人越围越多，队伍越走越长。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身边这个瘦弱的妇女，就是党派来支持和领导这次罢工的赵一曼。赵一曼从工人手中接过一张正在传递的传单，高声朗读起来：“同胞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的东北国土，把我们像奴隶牛马一般看待……。”这次罢工一直坚持了两天半，日本领事馆最后不得不表面接受了工人提出的保护工人生命安全，赔偿医疗费，惩办肇事凶手等条件。

由于哈尔滨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赵一曼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她时常发现有特务跟踪和监视她的行动。为此，党组织决定将她调到珠河中心县委工作。

四、奋战在珠河

1934年春，一曼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县委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抗日游击区开展工作，任铁路北区的区委书记。

她经常活动于亮珠河一带，在那里她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她肩负着很重要的工作，如：发动农民参军参战、为部队筹集钱财、购买药品安置伤员，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片根据地上，她与人民建立了血肉的联系，人们亲切地称她“瘦李”、“李姐”。

一次，赵一曼脑后挽着一个发髻，穿着一件黑色夹袄，手里提着一个花包袱，化装成一个农村姑娘和妇女会的李大姐一起到附近几个村子的乡亲们家，专门为伤员们收集营养慰问品。回来时，她们一老一少地走在小土路上，不巧遇到了敌人。她们已无法躲避，只好硬着头皮迎了上去。“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走在前边的一个汉奸问道。李大姐把一曼往身后一拉，回答说：“长官，我们是去走亲戚的。”这个汉奸推开李大姐走到一曼跟前，上下打量着她，喝道：“你是哪个屯子的？姓什么？”一曼装作很慌张的样子，胆怯地看着李大姐。李大姐向前迈了一步回答说：“她是我的女儿，我们姓李！”“我问的是她，你不许多嘴！”汉奸猛地转过身来问一曼：“你怎么不回答？”李大姐赶紧上前说：“她是哑巴，不会说话了。让我们过去吧，我们过了前面的山坡就到了。”敌人抢过包袱和篮子，发现都是挂面和鸡蛋，便得意地拿走了。一曼和李大姐站在那里一直等敌人走远了，才松了口气。一曼的四川口音没有被敌人发现，她们以机智、勇敢摆脱了敌人。她们只好再到另外几个村子收集了些鸡蛋，赶回来给伤员们吃。通过这件事，一曼更坚定的相信：依靠人民群众就能战胜敌人，自己也会得到保护。

在斗争中赵一曼有勇有智，总能很圆满地作好工作。有一次中心县委买了一批短枪和子弹，由于敌人对城门看守得严而无法运出，一曼就和另一个女战士承担了送武器的任务。她俩前思后想，想出一条妙计。他们将短枪和子弹用油布包扎起来后，放进大粪车中，然后赶着车向城门走去，在城门岗上的日军见大粪车来了，马上捂着鼻子走开了，负责检查的伪军站在老远的地方向她们挥着手大叫：“快走！快走！”她们一路顺利地把武器运到了目的地。回到营地后，她们绘声绘色地向同志们讲起她们运送武器、弹药的经过，同志们捧腹大笑，称赞她们的机智灵活。

赵一曼在指挥战斗中也表现了一个指挥者的领导和指挥才能。有一次，东北人民革命军的一个团在侯林乡被敌人紧紧地包围了，双方激战了一天一夜，敌人的增援部队不断向我军发起进攻，同时又有迫击炮、重机枪配合进攻。我军将士勇猛作战，打退敌人的一次次围攻，但处境十分危险，团长决定指挥部队选择敌人的一个弱点进行突围。凌晨三点钟左右，一曼发现我军与敌军交火，为配合我军作战，她侦察到敌人指挥部的位置，带着农民自卫军和群众从敌人后方发起进攻，狠狠地打击敌人的要害部位。敌人毫无防备，腹背受敌又摸不清情况，只好狼狈逃窜，逃窜时已溃不成军。这次战斗解除了敌军对我军的包围，俘虏了一批敌伤员，缴获了一批武器，保护了我军的有生力量。

赵一曼来到珠河抗日游击区的这段时间里，除了参加战斗就是做群众工作，而心里却从来不考虑她自己。

一天晚上，奔波了一天的一曼回到住的地方，倒头便睡下了。她睡得那

样香、那样沉，她太疲劳了。突然，村外传来激烈的枪声，房东大嫂急忙推醒一曼，她坐起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出了什么事？”房东大嫂急促地说：“鬼子快进屯子了，你赶快往北山上跑吧！”一曼听到村外的枪声越来越近，她来不及想什么，连忙把文件塞到炕洞里，转身向房东大嫂指的方向跑去。刚跑到村口，她忽然想起住在村东头的区委宣传部部长周伯学，周伯学是个近视眼，行动迟缓些，不知他能否转移？于是她又跑回村子，来到周伯学住处，伸手拼命砸门，门没叫开反而招来了两个伪军，伪军端着枪走到她的身后，问道：“你是哪家的？快说！村里有谁家通共匪？”她仍然是一副东北农村妇女的打扮，镇定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什么事都没看见一样，她冷冷地回答：“不知道！”一曼的四川口音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敌人团团围住她追问，她不肯回答，敌人见她不回答就用枪向她砸去，她的发髻被打掉了，敌人看到她可疑便抓住了她。

一曼想到这回是躲不过去了，她对着蜂拥而上的敌人，轻蔑地说：“不用推，我自己走！”于是她昂着头、挺着胸走在敌人的前面。群众都为她的安危担心。

党组织知道她被捕的消息，立刻设法把她救了出来。有了这次监狱生活的考验，一曼变得更加坚强，她一出狱就立刻又回到了群众中。

自从日军侵占了东北，几乎年年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冬季、春季大“讨伐”。1935年的秋天，东北的天气已是十分寒冷，日寇又调集了几十万兵力向我东北游击区进行了野蛮的进攻，他们推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我游击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为了坚持斗争、钳制敌人，支持第三军主力东征，赵一曼率领农民游击连配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作战，一曼以道北区委书记的名义担任人民革命军第二团的政治委员职务。

一天，赵一曼和同志们在左撇子沟里过夜，黎明时被敌人发现，敌人包围了他们。团长王惠同站起来命令大家：“准备战斗！”边说边带着大家冲上山去，准备与来敌进行一场浴血奋战。这股敌人是珠河县的讨伐队，六百多人占领了周围的每个山头，准备把赵一曼、王惠同领导的这支抗日队伍彻底消灭。敌人武器精良不可一世，我军虽然人少，但个个英勇顽强。双方苦战了整整一天，炮火始终没有终止。抗日将士们打退了敌人的六次进攻，但部队的弹药越来越少，受伤的同志也越来越多了。

天色黑下来了，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在山头点起一堆堆的篝火。一曼和王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趁天黑立刻突围。一曼看了看众多的伤员，心里十分难过，要带着这么多伤员一起突围简直太困难了。怎么办呢？她考虑了一下，坚定地说：“给我留下一个班的人，我负责掩护，你带领部队和伤员突围！”“那怎么行！不能把你留下，你是女同志，我来掩护！……”王团长果断地说。赵一曼严肃地说：“没有时间再争论！什么男的女的！你的责任是把部队带出去！快走！”一曼不容王团长再争论，“你只记得我是个妇女，却忘记了我是同志！”王团长不再争论了，是的，部队和伤员等待他去指挥，但是，他知道这回是很难再见到了，他深情地看着这个与自己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既瘦弱又坚强的女政委，与她约定了突围后会合的地点，然后转身带部队向西北方向突围去了。

赵一曼叫同志们在山前山后点燃一堆堆篝火，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这边。她把身边仅有的十几个战士召集起来，布置了掩护的任务后，坚定地说：“一

定要掩护同志们安全撤退！”四周的枪声、手榴弹的声音骤起，一曼意识到敌人又开始进攻了。她带领战士们向敌人猛烈地还击，突然她感到自己的肩膀一热，知道这是负了伤，她顾不得包扎，猛然跃身向敌人投去最后一颗手榴弹，然后纵身跳下山崖。她从山头滚到山底后就昏了过去。等她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山脚的草坪上，想起了刚才跳崖的情景，想到敌人已经占领了她们战斗过的山岗，敌人不会轻易地放过她们，一定会搜查的，必须马上转移。一曼辨认了一下方向就向前爬去。

她爬着爬着，忽然听见附近的石头响了一下，她紧握住手上的枪，警惕地问：“哪个？”“是李政委吗？我是老于！”老于参加革命前是个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他善于走山路，平时无论是在山里行军，还是在树林里出没，他都是走在前头的。他熟悉这里的山路，很是精明强干。这次他是被留下来与赵一曼一起掩护同志们转移的，任务完成后，又随一曼从山头滚下来。刚才的十几个人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其他同志都是在掩护王团长等人撤退时牺牲了。

一曼望着这位患难相处的战友激动极了，他俩紧紧地拉着手，会意地点点头。此时他们来不及再说什么了，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老于拉着一曼在山沟里钻来钻去，一路上，他们看到了不少这次突围时留下的战友们的尸体，却来不及掩埋。一曼难过地想：“等有机会一定再回来安顿你们！”

天快亮时，他们俩来到了一条山沟里，遇见了十六岁的妇女会员小杨。她是随王团长一起突围时被打散的，她独自一个人为了摆脱敌人的追赶，已奔走了一夜。她一见到一曼，如同见到了亲人，一下子扑到了赵一曼的怀里，边哭边说：“队伍被敌人打散了！我一个人拼命地跑，到处都听见敌人的叫喊声……”赵一曼心里明白了：王团长带队突围失败，队伍已经没有了。一曼心酸地拍着小杨的头，鼓励地说：“不要怕，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小杨抬起头望着政委默默地点点头。为了集合被打散的同志们，赵一曼与老于、小杨来到突围前和王团长约定好的会合地点，但是一个人也没有。他们不知是否还有活着的同志，赵一曼找到一块石头，招呼老于和小杨坐下，然后鼓励他们说：“咱们再干起来！有这两条枪，咱们什么也不怕！”三个人稍稍休息了一会儿，看到这不是久留之地，立刻起身离开了这里。

他们警惕地从沟底转过一个山头，发现前面有一个农舍。这个农舍周围是绿树、杂草，座落在半山坡上。一曼想这也许是哪个农民盖起来，用来看护庄稼或放牧牛羊时的临时住处。他们二个人走进了农舍，只见空洞洞的房间里堆放着很多高粱杆，可能是用来铺在地上休息的，再看看地面很干净，像是被人收拾过的。正当他们站在那儿察看屋内情况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你是瘦李子吧？”赵一曼一回头，看见一个人，头顶蓬乱的头发，满脸灰土，下巴上还挂着长长的胡子，穿着破烂的衣服，腰间裹着一根粗粗的绳子。她仔细打量着对方却认不出是谁。“你去年还要我去城里买过药的？”对方提示着。“噢，是老张头！”赵一曼终于认出来了，兴奋地大叫着：“我都不认识你了！你不是住在周桂沟吗？家里人好吗？”

一提到家里人，老张头的一双眼里像是要喷出仇恨的火焰。“他们都叫鬼子杀光了！我是拼着命逃出来的，我就是来找抗联的。我要为亲人报仇！”他说，“我宁死也不去敌人那边了！”赵一曼听到老张的话，心里很难过，她想：“人们对抗联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啊！他们是多么坚强！有这样的群众，我们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想到这里，她安慰老人说：“别难过！我

们是会为你报仇的！”老张头继续说：“昨天夜里，我听见山那边的枪声，我想肯定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与敌人打仗了！我爬上山头张望了很久，早上发现有人走过来，就躲进山洞里仔细察看，认定是你们以后我才走出来。”他把高粱杆铺在地上，叫同志们坐下，自己去烧了些开水，一方面让大家喝点水，一方面让赵一曼洗洗伤口。赵一曼这时才发现衣服与伤口粘在了一起。小杨帮她慢慢地撕开衣服，用水洗了一下伤口，还好子弹没有伤着骨头。赵一曼从旧棉衣里揪出一些棉絮递给小杨，小杨把它包在伤口上，又从衣服上撕下一条破布，把伤口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转眼功夫，老张头又给他们端来了一锅面汤，他们又惊又喜，围坐在一起用罐头盒盛了一些面汤，轮流吃起来。这面汤带着一股浓浓的霉味，他们光顾打仗，好几天没吃一口热饭了，吃着这些面汤却觉得格外香。平时老张头白天是不做饭的，因为烟火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只有到夜里才点火做点吃的。今天他看到同志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所以才把收藏很久的粮食拿出来做面汤吃。他热情地劝着大家：“吃吧！吃吧！”赵一曼看看老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知怎样感谢老人才好。赵一曼请老张头出去探听一下消息，自己带老于、小杨暂时在农舍里避一会儿。

凌晨，老张头回来了，他急冲冲地对一曼说：“不好了！王团长带领队伍突围时受了伤，被鬼子抓走了！队伍也散了！”听到同志们的消息后，一曼想到队伍不可能再会合了，于是决定马上离开这里。这时，门外忽然响起了枪声，他们四个人一下子站起来准备冲出去，可敌人已蜂拥而来，一阵枪响，子弹打中了她的右腿，她立刻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鲜血流在雪地上。他们落入了敌人手中。

五、狱中斗争

当赵一曼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绑在一架大车上，伤口在流着血。她看见小杨在自己身旁，脸上还有泪痕，车上还绑着几个同时被捕的抗联战士。她用微弱的声音对小杨说：“坚强些，不要怕……”小杨坚定地点了一下头。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过来训斥道：“不许说话！”“这小姑娘是我找来侍候我的，你们连她也不放过！她是个好老百姓！”赵一曼尽力大声地对敌人喊着。小杨明白：这是政委在掩护自己呀！她面临死亡，想到的却是自己！小杨的眼睛湿润了。路上从敌人的谈话中，她们才知道，昨天敌人的密探米振文看见山中冒烟，知道有人在那里做饭，就去报告了日伪第三讨伐队的队长张福兴。今早，张福兴带了二十多名伪军包围了他们休息的农舍，才抓住了他们。

赵一曼受伤的右腿疼痛极了。她咬着牙不哼一声。由于伤势很重，流血过多，一曼一直昏昏沉沉地躺在大车上。夜幕降临，大车进了一个城门洞，一曼问：“到什么地方了？”“到县城了！”不知是谁回答了一句，赵一曼立刻振奋了一下精神，高声对同志们说：“同志们，挺起胸来！让敌人看看我们抗联战士是坚强的！”同志们按政委的要求挺起了胸、昂起了头，跟着赵一曼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到底！”等口号。押送他们的敌人慌忙大叫：“不许喊叫！”车把式也不断地挥动鞭子，加快大车速度。战士们喊了一路，群众跟了一路，就这样赵一曼被押解到了珠河县城。到了伪县公署，赵一曼和小杨被扔进一个阴冷、潮湿、充满恶臭味的牢房里。由于大车的剧烈摇晃，一曼又昏过去了。敌人怕她因伤势过重而死，就连夜提审了她。她被带到审讯厅，刚刚苏醒就听到一个敌人催促地说：“快点审讯，不快审讯就要死了！”她怒视着这群野兽。她勉强支撑着受伤的躯体，痛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残害我中国人民的罪行，一直到她再次昏倒为止，她又被投进了牢房。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她又被门外的脚步声和叫喊声惊醒，几个人打开她的牢门，叫道：“出来！”小杨搀扶着她步履艰难地走出牢房，来到院子里。她看见王惠同也被敌人叫到院子里，没想到这对在战争中共同战斗的战友，能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重逢，他们悲喜交加。一曼忘记了自己的伤痛，向王团长走去，可她刚一迈步便摔倒在地上，“李政委”王惠同叫着马上走过去，把赵一曼扶起来，两双手又握在一起了，王团长被敌人拖开。敌人把抓来的人集中在院子里，让他们排成两排坐在长凳上，准备给他们照像。一曼明白这是敌人想利用这张照片去宣传，去显示自己的战功，诬蔑抗日联军。“决不能长敌人的志气！”一曼这样想着就带头大喊：“同志们，都站起来！我们抗联战士不是软骨头……”同志们霍地站起来，一边踢倒凳子，一边举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敌摄像师看到这种情形，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走开了。

面对敌人几次审问，一曼大义凛然，不是一言不发，就是回答：“不知道！”敌人连夜审讯了被捕在押的所有的人，最后分析出赵一曼是珠河中心县委委员，为了能得到一曼的口供，敌人又施展了恶毒的伎俩。

这一天清晨，敌人用绳子把赵一曼、王惠同绑到了小北门外一个旷野上，四周站满了日本兵，日本特务头子厉声喊道：“给你们最后三分钟，不说就枪毙！”赵一曼和王惠同昂头挺胸，一句话也不说。那个日本特务狠狠一抬

手，周围的一群鬼子拥上来，连打带推地把他们推到一个新挖的土坑前，他俩面对敌人的枪口，面不改色、心不跳，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敌人罪恶的枪声响了，王团长应声倒下，而赵一曼只听见耳边一声呼啸，她一动不动地等待着敌人继续开枪，但她再没听见枪声。日本特务头子走到她跟前，抓住她的衣服使劲地摇晃着她说：“你看看，这就是你的下场。”一曼想到牺牲的王团长，怒不可遏地骂道：“你这个毫无人性的野兽！”敌人认为她是个妇女，用这种方式吓唬她就能使她屈服。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赵一曼变得更加坚强。

敌伪滨江省警务厅听说抓到的是个女共产党，又是个当官的，就下令要把她活着带回。赵一曼又被押到了哈尔滨的警务厅。她经过死亡的考验，更是下定决心，准备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

赵一曼一进警务厅就被带进审讯厅，日本特务头子林宽重见她进来，皮笑肉不笑地迎上去，“请坐！请坐！”赵一曼看看他那副样子，心里十分厌恶。林宽重在她身边走来走去，一会儿他走到赵一曼的面前，摇动着他那猪头般的肥脑袋，用一口较熟练的中国话说：“我很相和你聊一聊。你是个有知识的人，怎么也会来干这种蠢事呢？”赵一曼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他继续假惺惺地说：“他们把你搞成这个样子，也没给你包扎一下伤口？这些混蛋！”然后他假装关心地说：“我马上派人送你到医院去！”他见赵一曼不理他，便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抗日？”赵一曼丝毫不让地回答：“我可明白你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林宽重知道他的对手是不好对付的，于是他又耍起花招来，“这场悲剧应该结束了！你为什么不出来尽点力量呢？……”“告诉我，你们的部队为什么不开到松江平原，而要开到松花江下游去？”赵一曼警惕起来，她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松花江上游、下游。”“难道你不关心他们的命运？你应该救他们回来！……”赵一曼冷冷地说：“还是挽救挽救你们自己吧！”

林宽重看软的不行，马上翻了脸，凶神恶煞地大叫着：“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赵一曼斩钉截铁地说：“我早就准备好了！”林宽重又说：“你们部队的去向我们已经掌握，现在给你机会，你要想想自己的命运！”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寸步不让地说：“你们的侵略行为早已为世人尽知！你们应该想到的是你们的命运！林宽重气急败坏地叫来两个特务把赵一曼拖了下去。

赵一曼被敌人吊起来，一个特务从墙上取下挂在上方的皮鞭，朝她的身上猛抽。接着，又用竹签在她的伤口上乱戳，一曼感到浑身像被撕裂一般绞痛，又昏了过去。敌人见她昏过去，便把她放下来，用冰冷的水向她脸上泼去。她又醒过来了，残忍的敌人又向她的指甲缝里钉竹签，钉进去又拔出来，反复折磨她。她每次都是咬着牙，决不出卖革命和战友。敌人无计可施了。

为了能从她嘴里得到关于共产党游击区的组织情况和抗日联军的活动计划，敌人必须让她活着，这时她腿上的枪伤已经化脓，敌人只好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治疗。

六、在医院里

赵一曼再次醒来时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白床单、白被子，还有穿着白大褂的小护士。她有些茫然，自言自语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呢？”小护士轻轻地回答她：“在市立医院里。”赵一曼脑海里闪过了这几天的事情：敌人的严刑拷打、王团长和战友们的牺牲，这些事深深地印在她的脑子里。她想到凶残的敌人能把她送进医院治疗，肯定还是想从她的嘴里得到共产党和抗联的情报。她愤怒地向护士喊着：“滚开！都滚开！去告诉鬼子要杀就杀！我什么也不会说的！”小护士对她说：“我是医院的护士，与鬼子不一样！”赵一曼叫了一阵后冷静下来，她想：既然我在医院里，也好！身体就可能好起来，身体好了就有逃出去的可能，我要想办法逃出去！继续寻找党和队伍，坚持抗战！

一位中年医生推门进来，他轻轻走到赵一曼的病床前，俯下身子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然后，又用手量了量赵一曼的脉搏，用听诊器认真地听了一下赵一曼的胸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地给赵一曼盖了一下被子。他对身边的小护士微笑地点了点头，与护士交谈了几句就轻身走出了病房。

赵一曼又警惕起来，她问小护士：“刚才那个日本人对你说什么？”小护士连忙分辩地说：“他不是日本人，他和我一样都是中国人。我们也恨日本人！请你相信我们，我们都是好人，不会伤害你的！他说你手术之后，身体正向好的方向转化，嘱咐我按时给你吃药。”小护士眼里闪着恳切、诚实的目光。一曼看出了小护士的真诚，便与小护士聊起天来。

小护士对一曼说：“你被送进来时，一直昏迷不醒、伤口化脓、奄奄一息。是刚才进来的那位张医生为你做了手术，你今天才醒过来。”小护士说：“我和张医生都希望你能尽快地好起来！”小护士又向赵一曼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小护士叫韩勇义，今年刚刚 17 岁。她本来应该有活泼快乐的生活，可是十分不幸的是她的亲生母亲已不在身边了，跟着后母过活。她的后母常常虐待她，她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的慈爱。如今长大了，舅父把她送进了这家医院当护士。她每天除了给病人打针、送药、为人倒痰盂、扫地、擦地板外，还常常遭到别人的斥骂。小韩平时很少说话，也不愿意与人多接触。如今一个抗日女英雄成为了她的病人，她格外耐心地照顾着一曼。

这一天她又给赵一曼送药来了。她一手拿药，一手端着水来到赵一曼床头，招呼一曼吃药后，不愿意离开，想借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些关于赵一曼的事情。她很认真地问道：“你就是报上登的那个骑马跨枪打日寇的赵一曼吗？”赵一曼微笑地回答：“是的，就算是吧！”小韩又问：“那天你被送进医院时浑身是血。遍体鳞伤，你受得了吗？”赵一曼望望天花板，一字一句地对小韩说：“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叛自己的信仰，出卖自己的同志！”看上去似懂非懂的小韩对赵一曼所做的事情不一定全都理解，但是她意识到赵一曼是在干一项她自己看作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的事情。为实现这个目标，她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

小韩与赵一曼越来越熟悉了，她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友谊。小韩每天精心地照料着赵一曼，为她换药、喂饭、洗衣、擦身，赵一曼的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了。小韩真心地希望赵一曼能够早些离开日本鬼子的魔窟。

转眼到了 4 月份，哈尔滨的天气仍然是变化无常。看守董宪勋被伪警察

厅调来专门监视赵一曼。董宪勋是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人，他从小失去父母成为一个孤儿，是叔父收养了他。叔父带他逃荒来到关外，生活虽然很穷，可叔父仍然节衣缩食地供他上学。在叔父的照顾下，他长大了。如今他误入歧途，当上了伪警察。他听说自己看守的就是报纸上常提到的抗日联军的女英雄赵一曼。他亲眼看到赵一曼如何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抗日主张，宁死不屈。他常常为自己走错了路而感到内疚和懊悔。赵一曼也看出了他的矛盾心理，就主动地接近他，用中国人应该以民族大义为重，要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道理启发、教育他；一曼还常给他讲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故事，讲那些血气方刚的抗联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在赵一曼的帮助下，董宪勋发生了变化。他从同情革命到敬佩抗日英雄、愿意为抗日做事。

自从看守换上了小董后，赵一曼得到了不少的“自由”。她常能从小董那里要来些铅笔和纸，深情地写下了自己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写下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小董见后深受感动。他对赵一曼说：“等将来我也要参加抗联。”他利用职务之便主动为赵一曼放哨。

一天夜晚，赵一曼和小韩正在病房里聊天，小董站在外边。突然日本特务吴树桂向病房这边走来，小董知道他来准没有好事，为了掩护赵一曼和小韩，使她们的谈话不被敌人听见，他故意大声咳嗽了一声，又提高嗓门大声地过去打招呼：“吴巡长，您来了？”赵一曼他们听到后立刻停止了谈话，装作没事的样子。

赵一曼身边的这两个正直的青年在她的帮助下，进步很快。随着时间的推移，赵一曼的伤口愈合起来，身体也好多了，被打断的腿也逐渐地长出了新骨头。同时，日本特务也越来越频繁地来到医院对赵一曼进行监视，他们隔三差五地轮流来察看。特务头子林宽重也常提着水果、点心等食物装作很关心的样子来看望。赵一曼心里十分明白，老奸巨狡的日本特务林宽重正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果然，日本特务来病房的次数日益增加，敌人把审讯转到了赵一曼的病房。特务每次来审讯，赵一曼回答的只有“不知道！”三个字，特务们每听到这样的回答，就会恼羞成怒地毒打她一次，残酷地折磨她一次。但是，赵一曼从敌人审讯时疯狂的样子中清楚地知道，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抗联的活越、说明敌人无能为力。她想，只要有抗联存在，抗日活动就不会中止，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活动就会受到阻碍，她深深地为自己的同志还坚持抗日斗争而高兴。

一天，刽子手吴树桂来到赵一曼的病房，赵一曼毫不理会，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吴树桂故意在赵一曼面前转来转去，得意忘形地挥着拳头说：“我又来打你了！我是一天不打人就手痒痒。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个毛病！”赵一曼冷笑了一下，讥讽地对他说：“这还算毛病！狗不咬人就不是好狗！”吴树桂凶神恶煞地对赵一曼吼叫道：“你竟敢侮辱老子，你也不打听一下，我是什么人！人家都叫我‘活阎王’！”赵一曼接过话来说：“活阎王？反正不是人！”这下可惹怒了这个刽子手，他抽出挂在腰上的竹箭狠狠地向赵一曼右腿的伤口上戳了一下，顿时还没有长好的伤口上鲜血直流。一直在外面的林宽重突然用脚踢开了房门闯了进来，直冲着吴树桂走去，装腔作势地喊：“谁叫你来的？你给我滚出去！赶紧滚出去！”然后他走到赵一曼跟前连声说：“对不起！向你抱歉，我的下级对你太无理了，都是我管教不严！”赵

一曼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林宽重的表演，心里暗自发笑，她明白这是敌人常用的手法。随林宽重同来的还有几个日本特务，他们分别坐在赵一曼病床的两侧，假惺惺地与她一起拉家常话。林宽重说：“一个女人为什么偏要出去打仗呢？依我看，女人最合适的职业是做个教员、医生或者做个律师。你说对不对？”“是的，我天天都在想，等将来有一天把你们赶出中国以后，我就到乡下做个教员。”赵一曼不紧不慢的回答使林宽重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停了片刻，突然大笑起来，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你是个梦想家，但你还是丢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吧！”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但却带着威胁，“你在我的手里，死活全由我决定。我把你送进医院，你就住院。我要想把你放掉就能放掉你！只要你要真心悔过，我就会放你出去。你出去后就可以去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赵一曼听着心中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她大声喊着：“你们这些强盗才应该悔过，你们野蛮地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掠夺我们的人民。我恨你们！我要杀你们！杀得一个不剩！”林宽重大叫“疯子，你简直疯了！”他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又进来两个日本特务，继续审讯她。赵一曼冷静多了，她知道敌人在对她进行“轮流审讯”。她想，自己必须冷静，否则话多必有失，稍微一点点的疏忽就可能会给党和同志们带来不幸的。所以，她又闭紧嘴巴一言不发，无论敌人怎样审讯她，她的回答就是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怒视着这些强盗。

这次审讯整整进行了一天。到了傍晚，日本特务头子林宽重从充满自信到完全失去了信心。他杀气腾腾地冲进病房，凶狠地大叫着：“我们用不着再绕圈子了，这场谈话该结束了！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你是要死还是要活？”赵一曼猛地坐起来，毫不退让地说：“早就不应该这样浪费时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杀就杀吧！”林宽重这回真的疯狂了，他像一头凶恶的野兽，把积攒了很长时间的气恼全部发泄了出来。他一把把赵一曼揪到地上，用手拽着她的头发，用脚狠狠地向她的伤口上乱踢。赵一曼知道这已是决战的时候了，她挺起虚弱的身体，拉住这个狗特务的手腕，拼尽全力咬了一口。林宽重痛得大叫一声，用另一只手捂住被咬的手腕，抬起穿着皮靴的脚，拼命向赵一曼狠狠地踢过去，赵一曼再一次昏了过去。

日本特务彻底绝望了，他没有想到这个瘦弱的女人，竟然如此强硬，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一个共产党员、抗联战士的伟大胸怀。

七、越狱

这一天日本特务对赵一曼的折磨和赵一曼坚强不屈的精神，使一直守在门外的护士小韩、看守小董受到了极大的教育。过去在医院里很少与外界接触的小韩和在敌人魔窟里生活的小董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他们进一步认识了日本强盗的凶残和共产党员的坚强，他们的心里都被强烈地震撼着。

日本特务走了以后，小韩紧紧地抱起赵一曼，摸着她的胸口，知道她还活着。她急忙叫小董帮她把赵一曼抬到床上，然后叫来张医生。张医生看见被糟蹋得不省人事的赵一曼，气愤地对看守小董大喊：“为什么你们叫我把她治好，又这样来打她！既然这样，不如当初你们就别把她送来，干脆把她杀掉……”这个正直的中国医生满脸火气，他被日本鬼子的残暴激怒了。小董像是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头也不敢抬地请求张医生的饶恕：“这不关我的事！不是我的事！”其实他的心里与张医生一样的气愤呀！

这一夜小韩一直没有合眼，她守护在赵一曼的身边忙碌着，一会儿给她洗伤口，一会儿给她敷药，一刻也不离开她。就是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她也呆呆地看着赵一曼身上的伤痕：她的全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伤口被踢得重新流血；脸上被烟头烫出了一个个紫泡；散乱的头发被揪得剩得很少，赵一曼紧闭着双眼，仍然是那样安详。小韩从她身上看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民族、为人民。

赵一曼醒过来了。经过又一次的生死考验，身体已经越来越差，小韩和医务人员精心地照顾才使她又有所好转。特务们又是出出进进不肯放过她，总想寻机从赵一曼嘴里得到些自己需要的东西，可是他们又失望了。赵一曼每次回答都是“不知道”，或是一言不发，特务们每次徒手而归时都很气恼，但又无计可施。

赵一曼常常坐在病床上，眼睛总是望着窗外。小韩和小董心里都很明白，她又在想战友和部队了。一次，小韩看到赵一曼又一声不响地望着窗外，小韩心里也很难过，她看了看周围没有人，就轻轻地趴在赵一曼的床头，小声地说：“我们逃跑吧，去找你的队伍和你的同志们！”赵一曼何曾不想逃出去回到同志们的身边？她早就恨不得能飞到抗日联军的队伍里，飞到党组织的怀抱。但她马上意识到事关重大，必须谨慎，不能出一丁点的疏漏。她向小韩摇了摇手，轻声地说：“如果跑不成呢？”“跑不成也得跑，总比在这里活活等死好！”小韩仍然坚持着。“我们还得仔细想想！不可以冒失行动！”赵一曼上次就因为疏忽，被敌人抓住。这回无论如何不能疏忽了，否则不仅自己会吃亏，还会连累小韩的，赵一曼沉默了。小韩也沉默了，因为她知道要救赵一曼的唯一办法就是帮助她逃出这暗无天日的魔窟。

在和赵一曼接触的几个月里，小韩和小董已经完全成了赵一曼的“同党”了。他们开始了筹划如何逃跑的计划。他们逃跑后的去向定在宾县三区，那里是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同志率领的抗日联军第三军活动的地方。韩义勇负责经济上的准备，为此小韩卖掉了自己的戒指和大衣；董宪勋负责物质上的准备，小董托人为赵一曼做了小轿。

他们越狱的计划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天下着倾盆大雨，小董气喘嘘嘘地跑进病房对赵一曼说：“不好了！日本人决定马上要枪毙你！刚才翻译官来了，要我这两天好好地看守你，就在这两天……”听到这一消息，小韩着急地哭了起来，一个劲地说：“我

们怎么办？怎么办呢？”小董果断地说：“只有马上逃跑，没有其他办法！”小韩亟不可待地说：“走！我们马上就走！”赵一曼望着这两个热血青年，心里非常激动。她镇定地招呼着他们俩：“过来！听我说！”赵一曼把逃跑的方向和逃走的办法做了安排。

6月28日白天，病房依然和平常一样，赵一曼依旧躺在那张病床上；韩义勇依旧穿着白大褂出入病房；董宪勋依旧背着长枪站在病房门外，这一天他们都格外小心。晚上，小董雇好了一辆由白俄司机开的车，在医院外面等候。

半夜，滂沱大雨下个不停。小韩为赵一曼换上了一件旧的旗袍，然后扶着一曼穿上鞋子。赵一曼住院以来伤口还没有痊愈，敌人的折磨使她身体很虚弱，现在站在地上就浑身发软，腿也迈不动步子。小韩架着赵一曼走出了长长的走廊，小董走过去将赵一曼背起下了台阶。之后，两个人搀着赵一曼穿过医院的小甬道，钻过木栅栏后，坐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汽车。

大雨中，一辆小汽车飞速地奔驰着，汽车在泥泞的道上颠簸着，泥水溅满了车身。小董为了安全不许白俄司机开灯，车一直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当汽车开到阿什河边不得不来了个急刹车，因为河上的石桥已被洪水冲断，汽车无法过河，小董只好向司机付了钱。他们三个人下了汽车，听见了河水的咆哮声。他们必须想办法尽快过河。两个年青人把赵一曼安排在桥头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小董吩咐小韩看好一曼，自己去雇抬小轿的人。一会儿功夫，小董就消失在黑夜中，不久小董带着雇来的两乘小轿，将他们艰难地抬过河来到了小董叔叔家里。

到了董老汉家，他们如同到了自己的家，很久没有到过这么温暖、舒适的环境了，他们真想好好休息一下。白天，他们不敢出去露面，怕路上人多暴露自己，只好躲在屋里烤衣服。小韩也利用这个机会为赵一曼换了药，包扎好。然后，他们抓紧时间吃了饭后休息了一阵，为晚上行动做好准备。

整整一天没敢出门。晚饭后，董老汉找了一辆大车，把他们三人送上了路。黑夜赶路是十分艰难的。他们不敢走大路，怕碰上敌人的哨卡，只能绕路而行，以避开敌人的检查。一夜的奔走大家都很疲劳，但是谁也不敢疏忽一点，他们一路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两只眼睛眨也不敢眨，警惕地注视着周围。中午，他们来到了王永汗屯附近。这个地方离他们要去的安全地带只有20里地了，他们的精神稍微轻松了一下。马上就要到抗日游击区了，就要参加到抗日的斗争中了，他们能不感到激动吗？

忽然，后边传来了急促的枪声。这是敌人追上来了。他们刚刚松弛的精神又像上了弦一样绷得很紧。赵一曼镇定地对大家说：“不要慌！你们要记住，敌人要是审问你们，你们就用我教给你们的口供，是我要带你们到乡下结婚的……。无论碰到什么情况也不能说出我们要去的地方！”赶车的老汉挥着鞭子，拼命地抽打着马屁股，但是已经没有用了。敌人已追上了他们。日本特务头子林宽重跳下了马，用手中的鞭子狠狠地抽打着这三个人。赵一曼一句高过一句地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杀死日本强盗！”几个日本特务冲了过来，把赵一曼死死地压住，用绳子结结实实地绑住，用毛巾堵住了她的嘴。

原来昨天上午，伪警察署接到医院的报告，知道赵一曼逃走了。于是，他们调查了当天出入医院的人员和车辆。他们根据赵一曼的情况分析，认为赵一曼是不能独自逃走的，也不可能走出去。他们终于从那个白俄司机的嘴

里知道了赵一曼三个人逃跑的全部情况。林宽重立刻带了 20 多个特务上了卡车，一直追到阿什河的断桥前，卡车过不去他们就跑到老乡那里抢了 20 多匹马骑上继续追赶，最后终于追赶上了赵一曼。赵一曼再一次落入了敌人手中。她坚定地昂着头，望着蓝天、田野，心里十分清楚这回是凶多吉少。林宽重是不会放过她的。但是她是不怕死的，她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准备迎接新的考验。

八、壮烈牺牲

赵一曼又被日本特务带回了哈尔滨警察厅。在审讯室里，日本特务头子林宽重不再掩饰自己，他露出狰狞的面孔，凶神恶煞地望着这个女共产党员，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你们是逃不掉的！”赵一曼被紧紧地绑着，一动也不能动。她的脸上、身上到处都是鞭痕和血迹。她神态安详地坐在地上。当她听到这头野兽嚎叫的时候，情绪激动起来，她也大叫着：“你们也是逃不掉的！总有一天，我们的人民也会在这里审判你们的！”

听到赵一曼的叫喊，林宽重突然转换了口气，说：“我是看重了你的骨气，才没有杀你，不是软弱！”赵一曼知道敌人又采取了他惯用的诱骗手段了。林宽重又接着说：“过去的事我们可以不再追究，只要你现在明白，马上回头还来得及，告诉我，你们要逃到什么地方去？”赵一曼轻蔑地看了林宽重一眼，冷冷地说：“回部队去！”林宽重听了赵一曼的回答，眼睛忽然一亮，似乎觉得有了一丝希望，紧紧追问：“你的部队在什么地方？”赵一曼依然冷冷地说：“在住的地方！”林宽重感到自己被她愚弄了，他气得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突然，他转过身来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说：“这个问题你不愿意谈，我们就不谈。”他停了片刻，把话题一转说：“但是，你不是想自由吗？只要你写个声明，就可以获得自由！”赵一曼面色毫无表情，仍是冷冷地说：“好吧，我写！拿笔拿纸来！”林宽重没想到她竟然如此痛快就能答应，马上吩咐手下的特务们准备好纸和笔，又亲自给赵一曼松了绑，然后得意忘形地站在一边等待赵一曼写声明。

赵一曼接过纸和笔，果断地挥笔写下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站在身边的林宽重由刚才的得意渐渐地变得阴沉起来，气得脸色发灰。他杀气腾腾地冲过去抢过那张纸，把它撕得粉碎后狠狠地往地上一摔，狂叫着：“我要杀死你！”“你杀吧，你们杀死了多少中国人！你们可以杀死我，但却消灭不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林宽重兽性大发，猛地举起了屠刀，用刀背向赵一曼砍去，刀背重重地落在了她的肩膀上，她摇晃了两下，痛得昏倒在地上。

敌人又把赵一曼扔进牢房。阴冷的地面和铁窗外吹进的阵阵凉风使她渐渐苏醒过来，肩膀上剧烈的疼痛使她无法翻过身来，她只能静静地躺在地上。

她想起了韩义勇和董宪勋，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到底怎么样了？敌人对他们用刑了吗？这时她并不知道董宪勋已被敌人用了重刑，活活地被日本特务打死在监狱里了；韩义勇被日本特务送到伪法院判了一年的徒刑。

她又想起了自己的同志，入狱已经7个多月了，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样了？他们是不是又重新组织了力量继续与敌人作战了？他们是不是又打了胜仗？她想他们会坚持斗争的。她想起了她和二团的战友们在密林深处、在高山平原，灵活机动地与日伪军作战的情景。

她也想起了远离自己的亲人，想起了母亲听说她要离开家时那恋恋不舍的样子，不知她老人家身体怎样？他想起了引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大姐夫郑佑之，不知他现在在哪里活动？是否还在与敌人作战？她想起了与自己最亲近的二姐，想起自己与二姐共同组织白花场妇女同盟会的情景，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他们是否能愉快地生活？

她想起了王团长、老于、老张头等已经牺牲的战友，她真想告诉他们，自己没有辜负党组织的培养，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走他们走的道路。她想到自

己马上就要告别人生、告别同志们。她感到欣慰的是自己是个真正的抗联战士，真正的共产党员，她已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与敌人斗争。

这一天，她的心一会儿也没有安静下来，她既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又作为一个女儿、妻子、母亲，她把自己该想的都想到了。她是多么热爱生活、多么向往人生呀！平时行军打仗很少有时间想想这些，如今已到了最后的时刻这些事情一骨脑地全部涌上了她的心头。

整整三天了，敌人不给她吃任何东西，甚至不许她喝一口水，她的嘴唇干裂得渗出了血，她的右膀子被刀背砍断，整个右胳膊搭拉着。敌人怕她再次跳跑，给她带上了沉重的铁镣。8月1日，赵一曼又被押解回珠河县，在被押解途中，她向敌人要了纸和笔，她要给她那未成年的儿子宁儿写封遗书，告诉宁儿自己牺牲之前要对他说出的话：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在儿子刚刚一周岁时，她就把他送到了丈夫的堂兄家抚养。以后奔忙于革命工作中，再也没有见过他，但赵一曼心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自己的亲骨肉。在她即将牺牲的时候，她更加思念自己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接好革命的班，做个真正的革命后代。

到了珠河县伪公署，她又被关到她曾经住过的牢房。第二天天刚亮，她被敌人拖出来，五花大绑地捆在一辆马车上，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赵一曼明白了，敌人要把她押上刑场了。她将告别同志们、告别党、告别自己热爱的人民。她望着路两边的群众，真想对他们说点什么，但千言万语不知该怎么说，她轻轻地咳了一下，清了清干得直冒火的嗓子，用舌头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唱起了传遍东三省的、抗联战士最爱唱的《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收敛着战士的尸首，
尸首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透了旗帜，

……

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
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敌人吆喝着，不许她唱歌。她毫不理睬，虽然声音不大，但却充满了激情，充满了视死如归的精神，她坚定地唱着这支给她力量的歌曲。敌人看到这位临危不惧、勇于牺牲的抗联女英雄，胆颤心惊。跟在车后的群众被赵一曼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他们一直跟着这辆马车，为了向女英雄告别。敌人不住地阻拦着群众，不准许他们靠近。

马车到了小北门，敌人最后一次问赵一曼：“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赵一曼望了望周围的群众，高声地说：“为抗日而死是光荣的！”她要向群众

做最后一次讲演。敌人惊慌失措，七手八脚地把她从马车上拽下来。赵一曼从地上站起来，昂首挺胸，从容不迫，她奋力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罪恶的子弹响了。震动了珠河县。抗日女民族英雄倒下去了。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抗日救国，她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她只有31岁。

赵一曼牺牲了，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深深地怀念她。她的家乡宜宾县为她建立了纪念馆。郭沫若同志曾为纪念馆题了诗：

蜀中巾帼富英雄，
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
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
碧血染得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
珠河亿载漾东风。

她曾经住过的哈尔滨市立医院所在的那条街被命名为“一曼街”。她在东北参加抗日斗争和与敌人在狱中殊死斗争的事迹被陈列在东北烈士纪念馆。

赵一曼英勇地牺牲了。她的名字回荡在白山黑水间，响彻在中国大地上。

